

从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谈起

苏 双 碧

三十年代初，吴晗和胡适曾经有过一段较密切的往来，至今还留下他们之间往来的书信十多件。这些信件所反映的吴晗和胡适的关系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是必须认真考察的。因为，这是对吴晗作出历史评价时，不能回避的一个突出问题。十年动乱初期，这些信件被当作“吴晗的治学方法和反动政治思想是同胡适一脉相承的”，“接受了胡适的衣钵”的铁证，来讨伐吴晗的。一九七九年在替吴晗平反时，这段历史也只能避开不谈。其实这十几封信件主要都是谈学术的，谈治学方法的。吴晗在治学道路上接受胡适的影响，这是人所共知的，吴晗也从来不隐讳，他多次谈到“受胡适影响很深”，搞研究时“钻牛角尖”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必须引起注意的，就是多年左的思想影响，人们总有一种习惯看法，即由于胡适政治上反动，他的学生也就必然反动，凡是胡适的门生，都被当作反动加以批判和挞伐，十年浩劫中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例外的。其实这种看法是形而上学的，学生容易接受老师的治学方法和道路，但政治上的影响尽管是存在的，但它却不是必然的。

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，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，吴晗给他的“恩师”胡适写了一封信^①，这是在他们之间往来的十几封信中，唯一一篇是谈政治的，这封信一开头就对胡适说：“有一疑难问题，数月来亘亘于胸，未能解决，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！”什么问题呢？吴晗尖锐而激烈地指出：“处在现今的时局中，党

国领袖卖国，政府卖国，封疆大吏卖国，每日看报所能得到的是最初的‘镇静，镇静’！次之是‘政府已有最后准备，下最大决心，请信任，信任’！现在是：‘一切你们所要求的都答应，只要不拆我们的台就感谢不尽，无条件的屈服，屈服！’”这封信接着又写道：“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，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、丧心病狂的政府。”对国民党的卖国退让政策，愤慨之声跃然纸上。这绝不是对国难漠不关心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。吴晗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，对政府失去了信心，不抱有任何希望。但是，出路何在？他感到彷徨，他希望胡适能给他“指示一个出路”。众所周知，胡适是主张“科学救国”，反对爱国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，喊打倒之类的举动，胡适能给吴晗“指示”的当然也只有这样一条道路。

不过，吴晗对胡适的“读书救国”也并非全盘接受，由于吴晗热衷于读古书，又急于想在学术上闯出一条路来，他对“读书”这个口号有容易接受的一面，但“读书”能否“救国”？吴晗是有怀疑的。在同一封信中，他继续写道，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，喊打倒是无聊的，那么，学生“应否作个别行动，为自己争人格，为国家争光荣？”如果这些举动都不行，“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，二无可凭藉的势位；三无可号召的群众，空口说‘救国’是否有用？”这段话，对胡适简直是 将了一军。在这里，吴晗至少是把“读书救国”看成不过是空口说救国而已。他信中说的“争人格”，实际上是说人要有民族骨气，不能甘心当亡国奴，而“为国家争光荣”，显然是希望政府能抗日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，否则国家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呢？吴晗进一步指出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如果连这样一种思想行动都没有，就等于是“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，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，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只是‘屈服’、‘退让’，假使自己还是个人，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，这痛苦如何能忍受？”这些话可以看出吴晗对国家的关心，把自己和整个民族的

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那时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。同样，也可以断言，他的这些言论也绝不是来源于胡适的思想体系。

在国难当头，对于有点“热血”的青年，胡适的“读书救国”口号实际上也不能限制青年爱国。对此，吴晗在信中作了生动的描述。他说，他曾经力图要按照胡适开的“读书救国”的药方来消除内心的痛苦，但几经实验也无济于事。信中写道：“过去四个月，无时无刻不被这种痛苦所蹂躏，最初的克制办法，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，但是一出馆门，就仍被袭击，后来专写文章，冀图避免此项思虑，但是仍不成功……在就睡后仍然陷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思中，结果是成为照例的失眠。最近在历史系开始工作，整理咸、同、光三朝的《京报》，把它编一目录，起初几天，倒也感觉兴趣，可是后来渐渐有对外关系和军事的种种的记载出现，不由地把它和现在一一比较，结果只是愤怒、扼腕。”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吴晗对国事的关心，也说明胡适用“读书救国”来限制青年去关心国家大事，也是办不到的。存在决定意识，在面临着当亡国奴的时刻，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人，都不能自郁于“平静的书桌”之前，每天他们都会被国民党的屈膝投降所不安。如上所述，吴晗曾经用读书、写文章、整理史料来限制自己的思想范围，都没有成功。最终他还是“为着要知道现状的进展，不得不每天看报”。

可见，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当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什么读书、成名等等强有力的诱饵，也是阻止不了青年去关心国事的。从这封信看，吴晗想的和胡适想的并不一样，胡适的一些治学之道吴晗是由衷地接受的，胡适的不让学生参加爱国活动，吴晗就不以为然了。至于胡适当时反对共产党的主张，反对马列主义的行为，作为胡适的学生吴晗至少是并不清楚的，现在所能看到的吴晗致胡适的信中，没有发现吴晗政治上对胡适的附和。相反的，在上述这封信的最后还特别嘱咐胡适：“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，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，生在过去，备受先生的训

诲指导，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，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。”最后这段话内中讲的“有党籍的人”，当是指国民党，而不是指其他党派，可知吴晗不但对“政府卖国”感到愤慨，而且对加入国民党的人也是不信任的。至于“没有主张的人”，大约是指那些成天读书麻木不仁的人。显然，在他看来胡适当是属爱国一类的，他才会把希望寄托在胡适的指点上。

胡适收到吴晗的信后，到底给吴晗作了什么“指示”，现在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四个月后，即一九三二年六月，胡适发表了《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》一文，重新提出“科学救国”的道路。他说：“法国的巴斯德”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，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，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，他绝不想他显微镜底下，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。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，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。”^②因此，他要青年学生不论研究什么问题，都要“有点信心”。胡适当时给吴晗的回答，大约也只能是这么一些内容。而这些言论对吴晗这样一个爱国和读书都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来说，自然会发生影响的，至少使他没有勇气离开书本走上社会上抗日的行列。但这绝不是说吴晗从此爱国思想就淡薄了。

在整个学生时代，吴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伴始而终的，绝没有因为胡适向他灌输“读书救国”的主张，而削弱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。在致胡适信之后一个月，即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，吴晗以西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《过去种种》^③，由于对学生运动无声无息的不满，嘲笑了过去学生运动是“一窝蜂”。十年动乱时，抓住这句话，说吴晗是站在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”。其实，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作了肯定的评价，说它是“民族复兴的征兆”，是“最富生命力的奋斗者”。而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是“中国的专杀同胞不作别用的革命军阀”。除了那一点不太应该的嘲笑之外，上述思想难道不是和一个多月前致胡适的信的思想一脉相承吗？同月晚些时候，他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一

首《感事诗》^④。把感事写成诗，寓意于现实，其爱国主义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。诗中以“叱咤世惊狮梦醒，汤阴人作国魂夸”来赞扬主张抗日的将士，而以“翘首海东烽火赤，小朝廷远哭声遮”的诗句痛斥南京政府不顾人民死活，一味卖国的罪行。吴晗看到一些将领从关外逃到北京不去抗日，却还在“缓带轻裘事管弦”，非常气愤，指责他们是“马服有儿秦不帝”。当然，作为一个青年学生，吴晗并不知道张学良退到北京，是蒋介石不准抗日造成的，诗中的指责有点委屈张学良了。但全诗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思想，却是很明白的。

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略提一笔的，就是在蒋介石实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，吴晗特别推崇东林党人，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当他知道有一本书叫《碧血录》，是记载明末东林党人和阉党进行斗争而英勇牺牲的事迹的，就到处寻觅。一九三三年春节，他在厂甸的旧书摊上发现这本书，立即买了回来，并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：“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，价才三角，大喜，持归”。读完之后又写道：“读完此书，胸中不知是甜是辣，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，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，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，想一洒脱干净死去，活得不耐烦，便撒手告别，岂不快哉！”这段话表明，在国难当头，又受白色恐怖思想的禁锢，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。出路何在？连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不论是“读书救国”，还是醉心于研究明史，都压抑不住他这颗正直和爱国的心。

从吴晗和胡适的书信往来中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事实，在治学道路上，吴晗是接受胡适的影响的，在政治态度上，即使在三十年代初年，思想倾向也很不一样。其实，师生关系，首先是一传授和接受知识的关系，老师对学生在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上，往往有较深的影响，而在政治上虽然也会有影响，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政治态度可以随着时局的变迁，师生之间往往会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事实上，三十年代初年胡

适的一些大弟子，在三十年代之后，就和胡适发生了分野，例如吴晗、罗尔纲等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成了光荣的共产党人，而胡适却背着人民革命的方向越走越远。十年动乱期间，几个三十年代胡适的学生，都因师承胡适而挨批受斗，这是毫无道理的，老师反动学生必然跟着反动是没有根据的。

注

- ①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所。
- ②《独立评论》第七号。
- ③《清华周刊》第三十七卷第二期。
- ④《清华周刊》第三十七卷第三期。

介绍《辞书研究》丛刊

辞书学在国外是一门兴起不久的学科，目前我国学术界也很重视。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创刊的《辞书研究》丛刊，必将起到推动作用。

辞书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并有丰富的遗产，但过去还很少被人注意。现在，“四化”建设中，对辞书极为需要，尤其是科学研究和图书资料工作者，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。因此，有关部门正在努力编纂、出版各类辞书，以应需要。

《辞书研究》丛刊，到一九八〇年底已出版了四辑，内容丰富。其中关于涉及编纂辞书的理论和交流编纂辞书经验的有：《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》（罗竹风）、《试论辞书的政治性》（巢峰）、《论辞典的类型》（王德春）、《综合性辞书的体例》（严霁、王自强）、《辞书是怎样修订的》（罗竹风）、《关于〈汉语大字典〉的编纂工作》（赵振铎）等；介绍我国历史上的辞书有《中国辞书史话》（方厚枢）、《〈说文解字〉概述》（钱剑夫）、《〈艺文类聚〉概说》（潘树广）；介绍外国辞书的有《〈英国百科全书〉第十五版简介》（唐尚斌）及《日本的辞书》（资料）。另外每期均有简要报导一批编写中的词典和国内外最近出版的词典，方厚枢编的《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》也附在后面。

· 成喻言 ·